

亞太區域論壇

亞太區域政經新趨勢

會議記錄

CTPECC 秘書處

壹、會議時間

2021 年 3 月 24 日 10 點至 12 點。

貳、會議地點

台中國立中興大學。

參、與會人員

蔡東杰（國立中興大學法政學院院長）

廖舜右（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教授）

陳貞伶（美商甲骨文業務部經理）

徐家平（台灣發展研究院國際合作處主任）

黃晏奇（台灣經濟研究院國際事務處副研究員）

程明彥（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助理研究員）

沈宜瑾（國立中興大學日韓總和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肆、會議記錄

一、亞太地緣政治熱點—東海、南海、台海的對峙

蔡東杰院長為大會致開幕詞，並表示在討論亞太地區的發展，除了關注幾個時事熱點，更重要的是觀察結構上變化，其中最大的

變因來自於中國崛起下，美國霸權相對的衰弱，雖然可感受到區域內有威脅與挑戰存在，但大體而言，美國都認為整體局勢是可控的。過去美國並非將目光鎖定於中國，而是歐盟，所面對的方向是大西洋而非太平洋，直到歐巴馬政府時期才轉向。當美國勢力轉向亞太的基調確立後，會產生正面的效果，同時也會有競爭的存在，不論是政治、經濟、軍事安全，都將成為兵家競爭之地，因此亞太地區未來的動向將值得我們持續關注。最後也感謝 PECC 一同舉辦討論，讓大家交流想法，激發更多火花，也期待未來有下一個階段的討論繼續，不管是為學術或是社會都有幫助。

二、亞太合縱連橫熱點－APEC、ASEAN 與 AIIB

廖舜右教授表示合縱連橫的熱點應以廣度的面向進行分享，透過層次分析的角度來檢視亞太地區的行為者互動，包括雙邊、複邊關係與多邊機制。亞太地區中存在著美中兩極勢力，近年來也可以發現兩強的動作與措施越來越明顯，使得區域許多中小型國家都必須隨著這兩極漩渦打轉，或是找出自己最佳的戰略位置，因此雙邊或是複邊的關係可以一個口號「2、2、3、4」來檢視。

第一個 2 為「美日 2+2」，針對釣魚台、台灣海峽、北韓或是南海航行自由都有進一步的討論；第二個 2 為「美韓 2+2」，韓國過去十年來都沒有開過美韓 2+2，透過此次會議，可以發現著重的對象在於北韓與日本。比較美日與美韓的差異性，美日合作的策略可歸類為外向型，對外防止區域的威脅，特別是中國；美韓同盟則是內向型導向，確保朝鮮半島的安定。

3 為「中、俄、朝同盟」，中國、俄羅斯、北韓似乎也在成立一

個外交上的同盟，來對抗以美國為首的亞太同盟，不論在經濟、軍事，甚至在公衛議題上的合作，都可以發現三個國家相互靠近的態勢，從國際政治的角度來看，中國具有經濟實力、俄羅斯代表軍事實力，而北韓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

再來 4 為「四方安全對話」，包含美國、印度、日本、澳洲在內，討論的層次很多，但有一個關鍵詞在這個會議中完全沒有被提及，那就是中國，然而可以發現很多重要議題都是在針對中國。多邊會談與雙邊的差異在於，多邊涉及多國的利益，較無法以共同對抗特定對象的方式進行，反而是以願景取代之。

另外，若要再做延伸加一個 5，那「五眼聯盟」便可以加進來，但事實上把它定調為雙邊可能更為合適，因為五眼聯盟主要功能在情報與訊息的互享，那整體而言，「2、2、3、4、5」大概可以呈現亞太地區主要雙邊與複邊的輪廓。

雙邊或複邊相較在多邊機制中，更能達成共識，但若到多邊的場域，就有不同的面貌，如 APEC、ASEAN、AIIB，美中都在其中互動，其中的成員背景與利益也交錯複雜。APEC 用三個面向：地緣政治、地緣經濟、地緣科技來剖析。地緣政治很容易理解，早期 APEC 基本上可以定調為是美國的會議，以美國的聲音為主流，後來中國的聲音慢慢崛起，開始形成一個足以與美國抗衡的一股力量，近年川普的單邊主義，更加深了中國的主導力，又回到了如同過去美國獨大一般，失去多邊組織的多元性。而 APEC 成員基本上是沿著第一島鏈，同時也決定著成員在 APEC 當中的發言方向與立場，也因此許多法案都可以根據地緣政治的角度，做出相對應的預期，而因為疫情的關係，視訊會議頻繁，但視訊會議降低實體會議

的交流與交鋒。地緣經濟方面，打造一個安全的供應鏈是美國現在積極處理的方向，如晶片、疫苗等，雖然沒有指明誰是不安全的供應端，但有說明哪些國家是可靠的供應端，如美國本土、盟邦等都是可靠的供應鏈，這樣的議題在 APEC 當中也是重要的討論方向。地緣科技則從 5G 的主導權可以探知一二。

ASEAN 在亞太的戰略重要性逐漸增加，當中國家的發展程度不同，同時衝突也會增加，ASEAN 的整合會保持現在這形式，或是將會有更進一步的整合都有待觀察。南海議題對 ASEAN 而言也是一個重大的挑戰，由於利益交錯，ASEAN 國家不容易有一致的共識。AIIB 所代表的就是一帶一路資金運作的平台，從數據來看，可得知 AIIB 的重要性下降，一帶一路的負面描述也漸長，但未來一帶一路與 AIIB 是否會翻轉其負面形象有待後續觀察。

三、亞太數據投資熱點—資料中心 FDI 的動向

陳貞伶經理表示疫情關係導致工作形態的轉變讓很多人在家上班，全球有 27 億的員工都是如此，如此改變也導致許多經營上的弊病，企業的趨勢轉向智能化、自動化、尤其我國以製造業居多，過往專精在開發研發、也創造了一些經濟奇蹟，但接下來智能化自動化才是未來發展的重點，也希望透過智能化自動化能夠讓台灣的產業有加分、拓展的效果，

台灣的中小企業居多、很多公司並沒有建置完整的資訊人才，現在有些企業也把這些資訊化轉換到雲端上面，轉換到雲端上面有些好處、就是能透過高效能的服務來降低企業的成本甚至增加效

率，所以現在企業透過 IP 的轉型能夠讓我們的工作型態甚至使用者介面等等變得更加現代化，然後流程自動化，然後透過雲端的自動化也能提升我們企業的競爭力，怎麼樣讓我們的企業透過雲端實現企業的轉型、客戶滿意度、生產效率等等。

根據統計，我國有 80% 企業認為智能化自動化是我們企業下一個成功很重要的因素，這些服務取決於我們資料中心的建置，Google 會在台灣建立亞洲第四個資料中心，從 2011 年在新加坡設立、2013 年、19 年甚至 20 年三個數據中心都在台灣，Google 大舉投資台灣、也跟其策略有很大關係，微軟年初也有發佈會在台灣建置資料中心，微軟從 2016 年開始就針對以上對台灣進行投資，包含 2016 年的物聯網創新中心、人工製化發展中心等，這兩個美商巨頭選擇台灣的原因具有政治、經濟、技術、社會這 4 項因素。

政治面—台灣處於美中的中間地位、有其競爭優勢，台灣的投資環境排名在 BERI 中，經營風險、政治風險、匯兌風險在亞洲是排名第一的，在亞洲中相對穩健，政府也非常支持外部投資、打造了 4 個中心（高科技製造、研發、半導體先進製程、綠能發展）。

經濟面—亞太中心位置、經濟體制健全、自由度高，高科技產業注重智慧財產權、企業權利，台灣給予充足的保護，台灣面積雖小、但包含能源、土地、人力還是相對便宜。未來會面對能源限制的問題、所以像離岸風電、綠能的需求會大幅提升，台灣也會朝這部分重點發展來確保能支持這些投資。

社會面—台灣屬於開放性的國家，包含兩性平等、多元成家，讓外國人願意長時間生活在這裡，另外這一年因為防疫的突出表

現、經濟衝擊相對較小，創造穩定的生活環境。

技術面一半導體製程和資訊中心建置的供應鏈完善，台灣是許多國際大廠指定 OEM 的對象，台灣雖小但擁有的產業技術非常多、透過這些多元的技術優勢、組成，建立創新中心吸引年輕人發展，讓台灣成為一個小型實驗場、許多 Business Model 能夠很快地做測試。而因為疫情關係有很多的國外留學生回台發展，透過這些人才與原本台灣的 IT 優勢、激發出更好的發展。

綜合以上成為美商科技業選擇台灣的原因，資料中心、人才、科技經濟都有一些蠻有幫助的地方，像 Google 的資料中心帶動了台灣自動化的發展、基礎建設等等，學校也開始鼓勵學生從資料的維護改為鼓勵去學大數據的分析、人工智慧，從經濟發展來看也會有更多的跨產業合作，傳統製造業成為新的服務業。我們期望 Oracle 雲端能夠為在台灣企業中更普及、為台灣企業創造最佳的優勢。

四、亞太數位發展熱點—區域的 6G 佈局與政策

徐家平主任表示從 2G 開始，行動通訊以大約每 10 年一輪的速度更迭演進，每一次的躍進都大幅影響人類生活，2G 的類比轉數位通訊、3G 的行動上網、4G 的影音傳輸、5G 的視訊通話。2019 年 5G 的商轉更與過去聚焦個人娛樂不同、更延伸到工業、醫療、交通等領域，全面改變了世界的樣貌。2030 年 5G 極可能功成身退、改由 6G 接手，6G 最大的改變就是加入低軌道衛星、讓涵蓋率更廣、可多維度連結，但因頻寬少、需發射多顆衛星好讓衛星不斷換手，另由於衛星與地面基地站、新型天線等技術將互補成為 6G 的傳輸方

案，讓「萬物聯網」朝「萬物智聯」演進。6G 成熟後可望實現衛星間的直接通訊、超高速網路連接，支援智慧工廠、自駕車、機器人、混合實境等新應用，並透過不同衛星間的切換、漫遊，搭配光纖及奈米天線，成為全球覆蓋的高速網路。未來透過衛星 6G 可以實現對地球的立體覆蓋。為處在地球偏遠及落後地區的近 3 成人口提供寬頻網路服務。

在世界各國 6G 的佈局上，美國 ATIS 於 2020 年 10 月宣布成立「Next G」聯盟，成員包括高通、蘋果、Google、三星等 21 個跨國企業，將在未來 10 年推動北美地區行動通信技術在領先地位。中國方面則在 2019 年由科技部成立國家 6G 技術研發工作組及總體專家組，華為和中興也積極投入研發、現有 100-200 名研究人員致力於相關技術研究。日本則於 2020 年發布相關政策及自 2021 年起匡列 70 億日元預算挹注測試環境建置及鼓勵企業、大學共同推動研發。

另外韓國規劃自 2021 年起 5 年間投入 2000 億韓元投入研發、歐盟自 2018 年起啟動研究項目、印度則在 2020 年與日本簽署相關合作協議加強網路安全方面的合作、日本也將在當地投資電信業參與印度 6G 技術開發。

隨著 5G 在全球建設逐漸到位、各國對 6G 的開發也如火如荼的展開，甚至可能成為大國展示國力的場域。我國經濟部 5G 辦公室近期雖已正式轉型為 6G 辦公室，但尚未公布具體政策規劃，未來政府與民間企業必須積極合作開發，才能在未來市場發展上居於有利地位。

五、亞太國際組織熱點—多邊主義下的 APEC 再興

黃晏奇副研究員表示 APEC 於 1989 年成立、集合 21 個經濟體、具有共識決、自願性、非拘束性、開放區域主義等特性，目標在維持區域成長與發展、加強經濟相互依存的利益、降低經濟體間貨物與服務之貿易及投資障礙。

1994 年提出的茂物目標 (Bogor Goals) 讓已開發經濟體及開發中經濟體分別於 2010 年及 2020 年前達成貿易暨投資自由化與開放目標；接著 2020 年提出的太子城 2040 願景 (Putrajaya Vision 2040) 則希望為所有人民及未來世代的繁榮，促亞太在 2040 年前成為開放、活躍、堅韌且和平的社群。

2006 年 APEC 年會發表河內宣言點出世界貿易組織 (WTO) 談判停滯且區域經貿倡議以鄰為壑；由美國為首提出 FTAAP 應有全面、高品質等特性且可以回應次世代的貿易及投資議題、實現北京路徑圖、利馬宣言、太子城願景，FTAAP 須以現有的區域經貿安排為基礎推動，可能選項包含「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CEP) 及「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

RCEP 和 CPTPP 牽涉的國家很廣、也有各自主張的目標，但以 GDP 來看、RCEP 成員佔了全球 GDP 約 30% 而 CPTPP 也佔了 13%，所以兩者不管做什麼樣的策略都會對全球造成很大的影響，但兩者除了成員國外另一個很大差異的差異是 CPTPP 討論到了勞工、環境、國營事業、發展議題、透明化與反貪腐、法規、投資爭端解決機制。

APEC 成員國與 RCEP、CPTPP 重疊的比例很高，從這角度來看

不難理解為何要選後兩者來作為 FTAAP 的基礎，一但跟 RCEP、CPTPP 談成了，APEC 就不用去處理這些細節的問題，假設有一天實現了 FTAAP，整個 APEC 成員國在全球 GDP 的佔比會來到了 60% 以上。

為什麼 APEC 很重要，它是一個對話範圍很廣的平台、又有許多世界重要經濟體在其中，不管要合作、競爭都好，都是不可忽視的組織，另一方面經貿上面最重要的國際組織 WTO 自從杜哈回合談判後進度幾乎是零，而 APEC 共識決的特性讓他能做到比 WTO 更多的事情。

六、亞太治理競爭熱點—民主人權與治理能力的對話

程明彥助理研究員表示公司存在的目的是為了營利，為了營利、就要追求效率，而民主剛好是相對沒效率的一種治理方法，越多民主、越多參與，效率相對越低；然而，國家不是為了營利，即使在最極端的自由放任主義體制下，國家仍扮演守夜人角色，保障公民的基本權利。威權主義對掌握權力和資源的少數菁英負責，以少數人意見為主；民主主義則於定期選舉當中取得大多數選民信任，以多數人需求考量。

威權主義有效率卻不穩定，不穩定因素包括政策翻轉、領導階層更替、政變、難以想像原因，而引發預期外的損失。為了追求發展，可能給予外國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快速通關或高額利潤，但可能突然被取消。在經濟受控、領導階層鞏固權力、經濟行為具政治目的的條件下，將有可能間接造成接班人政策

延續的不穩定性。此外，威權主義國家為了追求經濟成長而建立法制，將有可能造成本質及概念衝突，進而引發民主化、自由化。

民主體制緩慢卻可預期，民主政治的核心是政治平等，也就是政府持續地對人民的需求保持回應，或於政策制定過程中，人民具有平等參與的機會、同時也遵守法治程序。

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 (Taiwan's Elec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Study, TEDs) 中有 43% 的民眾認為民主政治是比較好的體制，單以經濟發展績效來看，民主轉型與實質經濟成長並無顯著關聯，但沒有民主化的香港與新加坡卻出現更加惡化的貧富不均。因此若假設權力交給政治菁英，並移除課責機制，那麼人民不一定會獲得更好的治理績效，更有可能犧牲個人人權保障。

民主主義雖然未必能產生最好的結果，但相對有機會吃到「大碗的、想吃的」飯，民主化後的國家，人民所得通常會變得比較均等，而其主要原因主要是來自於民主社會下，人們在市場機制裡有平等的機會自由競爭。

七、亞太國際關係熱點—澳中關係的競合新發展

沈宜瑾副研究員表示澳洲近年來與中國衝突不斷升級，成為亞太同樣受矚目的熱點之一。在面對澳中過去到現在各種競合關係，有許多不同的理解，針對兩國未來關係的發展，可以透過幾項論點來進行分析與預期。澳中關係惡化是由於過去中國的勢力在澳洲國內進行深入的布局與滲透。

在 2017 年澳洲發布《反外國干預法》，雖未指明針對的對象是

哪個國家，但實際上則暗指中國。2018年，澳洲跟隨美國的反華戰略禁止華為5G設備，雖是針對中國企業，但仍然對於兩國關係產生負面影響。2020年新冠疫情大流行，澳洲發起對中國疫情實施自主調查，並呼籲各國一同參與，可以算是正式與中國交鋒。此外，針對南海議題，澳洲始終跟隨美國的戰略反對中國在南海的主權主張，使得雙方衝突再次升級，也因次帶來了隨後一系列中國對澳洲的經濟制裁。

關於澳中關係發展，未來兩國關係是否會持續惡化短期內有待觀察，但長期而言，澳中關係的惡化勢必會趨緩。論點有三：第一，兩國貿易互補性強。中國需要澳洲的金屬礦石、穀物；澳洲需要中國的留學生、觀光客，在經濟制裁底下，中國方面對澳洲的進口份額仍然持續上升，特別是在鐵礦的部份，而澳洲短期可以尋找替代出口市場，但成本高、利潤低，長期而言並非是一個好的貿易策略。

第二，澳洲內部的分歧。澳洲政府的對華基調可謂相當強硬，但事實上內部有許多聲音持續抨擊政府的反華態度，這樣的分歧可以理解來自過去中國勢力的滲透下，產生的親中勢力，以及在利益上受損而不願意反華的群體，不論政界、商界甚至是教育界都有不同的聲音出現。

第三，澳洲總理的更替。澳洲總理是國會選舉最大黨的黨魁當選，許多黨內惡鬥就會產生逼宮的現象總理沒有固定任期，但綜觀這十年來的總理之位，產生了五次的更迭，政局並非相當穩定。因此就算現階段的總理莫里森對中國態度相當強硬，並不代表這樣的態度能夠長期的延續下去。

上述主要以澳洲的角度論述之，但足以看出長期澳中關係並不會持續惡化下去，但我們仍可以從幾個地方去觀察兩國短期的發展，包括美國對華的戰略與態度，以及中國對外重心的放置點，由於中國面對其百年問題將近，重心多半放在新疆、香港與台灣，或許對澳洲的關注會稍微轉移，以上都值得未來我們持續追蹤。